

与此相对，沟口强调，发自东方纵轴上的内生性的现代化，并不是对于横压过来的“东方主义”性质的外压型现代化的抵抗，而是在并未意识到外来压力的情况下以独特的形式出现的。这也正是内生性发展依靠其不受外来“东方主义”束缚的主体性取得成功的原因。但是，以这种“主体性”真地能挣脱“东方主义”的束缚而实现纵向的内生性发展吗？为了探讨这一点，下面将视野重新转向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VI]

时间困境

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即“三面红旗”政策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在农业技术领域，首先强调的并不是要依赖于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之类的现代机械，而是要将双铧犁代表的中国传统农具改造成新的大型农机具，也就是不依靠作为“洋法”的西方技术，而是实行以“土法”为主的“土洋结合”。第二，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乡一级的人民公社层次也强调通过“自力更生”来实现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大幅度削减此前对地方的财政补助，同时也免去地方上交中央的大部分资金，作为地方政府的人民公社被赋予了财政自主权。这也就意味着将原来采取的苏联社会主义中央集权模式改变为财政领域的地方分权模式，²⁹但同时强化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央集权。第三，在经济上确立了用10年时间赶上英国的发展目标，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第三点表明，“三面红旗”并不止于对欧美现代化的单纯抵抗，而是以取得对欧美式现代化的胜利为最终目的。

进入60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之后，中国脱离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始追求非欧美模式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并获得了国内外的较高评价。借用沟口雄三的说法，可以看作是一种“内生型现代化”。但是，由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具有与欧美现代化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抗的强烈意识，用竹

内好的话来说，依然没有能够从心理上摆脱欧美的束缚。这也正是“三面红旗”政策最终破产的原因。

人民公社建立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基础之上，在当时的中国，农业人口仍然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正如前文多次提到的那样，农业具有深受生命循环周期限制的时间制约性，因此，提出用10年时间赶超英国的发展目标，意味着在农业领域也必须克服这种时间制约，实现时间的加速化。也就是说，由于构成欧美现代化物质层面的“国民经济”的形成及其加速发展，通常只有在工业革命促使农业社会向非农业社会转型的前提才有可能，因此人民公社也必须实现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进一步说，它以社会生产摆脱农业生命循环周期的制约而实现时间的加速化为前提条件。正是由于看到了这种转变的压力，竹内才凭直觉认为东方对西方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未实现上述产业结构转变的情况下试图超越农业本身具有的时间制约性，就意味着“三面红旗”的高速发展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即便能够将双铧犁之类的“土法”农业技术提升为大型农机具，目标总体的失败也难以避免。这几乎与把“十月怀胎”的时间和四到五年的育儿周期大幅度缩短一样不可能。实际上，“三面红旗”在1959—1961年间造成2000多万人死亡的事件，的确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政策失败。

那么，导致“三面红旗”政策最终失败的时间加速化的要求，以及对于欧美现代化的“胜利”的确信，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在1950年代的中国呢？其根源何在？让我们回顾一下胜利信心的最初由来。

对“胜利”的确信明显来自对于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胜利的记忆，特别是关于1942—1943年间陕甘宁边区展开的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村落共同体重建运动的记忆。但回顾上述运动的过程可以发现，那场运动并没有试图超越农业具有的时间制约性，其目标是抵抗威胁农民日常生活的外来势力，是为了保卫日常生活。进一步说，赢得深受生命循环周

期制约的农业活动的时间是抵抗的出发点，而毫无加速或缩短时间的意图。陕甘宁边区的村落共同体重建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探索新的“内生性发展模式”。因此，当时的抵抗并不是出于对外部势力的单纯“胜利”，而是朝向如何避免“失败”的维持生存。但是当日本投降，进而在中共取得了国共内战的胜利之后，新中国的领导人就产生了将村落共同体重建运动看作是革命胜利的根源的心理。

问题的焦点在于，抗战的胜利和国共内战的胜利都不过是军事政治的胜利，并不等同于“非西欧”发展模式的胜利。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却将两者等同了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

正如毛泽东在日中战争因卢沟桥事变而全面爆发之后写下的《论持久战》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持久”的时间观念与军事战略密切结合带来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承受持久战，是由于那是一场保卫具有持久性生命循环的农业生活的战争。要再次强调的是，大部分农民在那场战争中并没有脱离培育生命的土地。这同水保渔民在水保病抗争运动中没有脱离培育生命的不知火海一样。当然，当生活遭到摧残而难以为继，特别是当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死亡的情况下，农民和渔民有可能被迫离开生业之所而外出流浪。但在当时的中国，即便是流浪者，其保命的生业也依然是“农”，因此大部分流浪到外地的农民都以“客民”的身份进入陌生的村庄，³⁰并继续以植根于土地的农业为生计。

以中国农村社会的上述背景为前提，毛泽东进而指出，中国与生俱来的持久力在于其辽阔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这无疑是一种卓见。就物理层面上来看，要将附着于无边土地的庞大数量的农民“斩尽杀绝”，需要无限的时间，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还指出，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人口不足，因此无法承受持久战。

与毛泽东的这种看法相关，日中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战争。因为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近现代的历史完全是以欧美式的现代化为目标的“西化”的历史。在“西化”的

过程中，日本社会的时间意识确实随着“殖产兴业”而相对加速化了。应当看到，不仅日本的地狭人少使其无法承受需要漫长时间意识的持久战，“西化”的成功所带来的时间意识的加速化也不利于持久战。

另一方面，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时的30年代后期，日本仍然是48%的人口从事农林业和渔业的社会。³¹尽管“西化”取得了成功，这部分人口仍然带有日本此前所具有的受到生命循环周期制约的持久性时间观念。考虑到派往中国前线的士兵许多出自农村和渔村，他们本来在心理上是能够耐得住持久的时间的。因此，从持久战的角度来看，日中战争又带有“东方与东方”之间的战争的特征。

日中两国在战争中的差异在于，中国农民是在自己的家乡为保卫自己的生活空间进行抗战，而日本农村出身的士兵则是在遥远的异国为日本国家而战。这一差异来自于那场战争的本质，也即它是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在远离生业之所的异国战场上，并且由于其意识和身体都被国家政治所吞没，日本农村出身的士兵的“持久性”意识也就必然会衰弱。

当然，就战争而言，仅有强韧的持久性即便能够避免失败，也未必会赢得胜利。因此，毛泽东在将持久战看作取胜的积极因素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的因素。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³²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出色地预见到了珍珠港事件之后国际战局的演变。实际上，日本失败兆头的明朗化开始于珍珠港事件爆发一年半左右的1943年中期。在中国战场上，当时日军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如长沙战役和衡阳战役）。可以说，由于持久战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两个因素，中国的抗战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

从政治和军事的方面来看，不能否认，中国的内生性社会变革产生的“现代化模式”，带来了超过敌人力量的战斗力，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点同样适用于1965-1975年间的越南战争。几乎在越南战争以美军“痛苦的失败”而告终的同时，安德鲁·马克于1975年初指出，美国失败的原因在于越南战争是一场“非对称性战争”（asymmetric conflict）。³³永井阳之助在援用马克观点的基础上，更明确地用“时间的政治学”概念进行了解释。³⁴战争的“非对称性”首先表现在双方参战士兵不同的时间意识。从1965年越战爆发时的状况来看，在J·K·加尔布雷斯称之为“丰裕社会”的美国，交通和通讯技术已经高度发达和普及，人们的时间意识当然也高速化了。从人口构成上看，受到生命循环周期制约的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已经很低。因此，除了收入通常较低的制造业中的单纯体力性工种，对于一般的美国青年来说，从军数年意味着他们回国后很难找到理想的职位。但是，包括黑人士兵在内的大部分美国士兵事先都没有预料到战争会那样漫长，因此在1966年秋天战争爆发一年多而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之后，越南前线的美军士兵就出现了强烈的厌战情绪，回国的退伍军人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心理性疾病“越战综合症”，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进而，以此为背景，美国国内出现了黑人争取公民权的运动，再加上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席卷了整个欧美乃至日本社会，对美国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他们如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农民一样，是为了守卫自己的日常生活才拿起枪支的，因此具有强韧的耐力，这种持久性的战斗力并没有因为战争的长期化而衰退。由此可见，越南战争是一场时间意识上的非对称战争。到1968年秋，无法承受持久战的美军开始走向失败。

从军事政治的方面来看，无法避免时间加速化的欧美现代化模式，必然在多数情况下事实上败给经受得住漫长时间熬炼的“非欧美模式”。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在各自的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都

源自于此。

但是，军事政治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作为现代化模式的“非欧美模式”在和平时期也比欧美模式优越。在和平时期，欧美现代化模式因其伴随着时间加速化的高度产业化文明，符合民众追求物质富裕的普遍愿望，带有向全球渗透的力量而扩张。也就是说，“非欧美模式”在军事政治方面所具有的高度持久性，反过来意味着经济发展上的时间效率的低下和相对的物质贫困，毋宁说劣于欧美现代化模式。

从上述脉络来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缺少对于欧美现代化模式的“失败的自觉”，当然也就在缺少“对于失败的持续抵抗”即“挣扎”的情况下试图推进其独自的模式。如果说正是持续抵抗或“挣扎”成为非欧洲模式得以守护民众等身大的非政治性日常生活的依据，那么，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忘记了这一点，才催生了民众的时间意识的加速化，进一步说，它也是民众的意识脱离了对非政治世界的村落防卫而向“国家政治”跳跃的原因。这同时也表明，毛泽东时代的非欧洲模式依然没有能够摆脱“东方主义”的束缚，进而，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期的中国，当意识到对于欧美模式的物质经济层面的失败之后，完全放弃了“对于失败的持续抵抗”，采取了全面的高速增长路线，并很快进入了由高速时间所支配的社会，从而紧紧地受到“东方主义”的束缚。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今天，在都忘记了“挣扎”这一点上，可以说都丧失了主体性。用竹内好的话说，就是“丧失了自我，既非西欧也非亚洲，因此啥都不是。”这也正是当今中国社会严峻的“无思想”状况普遍化的原因。

与此相映，越南虽然也取得了军事政治上的胜利，但并没有拘泥于对胜利的信心，而是通过改革主动放弃了其原本具有持久性的非欧美东方模式，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变，在经济方面迈向时间加速化的欧美模式。可以想象，这一点同越南早在1975年就注意到了毛泽东政策带来的悲惨结局从而将其当作教训有关。但反过来说，由于越南异常

痛快地放弃了非西欧模式，因此，它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一样，也陷入了深受“东方主义”束缚的无主体性状态。

[VII]

“情念国家”的形成与克理斯玛： 中日两国的相似性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战前和战争时期的日本有两个惊人相似的地方。第一是对于“胜利”的确信，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意识形态认为一定能够赶上和超过欧美现代模式，并且这种模式必然能够造就东方的“现代”（因此也就是“超现代”）；第二，重视增强国家的物质力量，同时又把这种物质力量单纯地当作远比西方科学技术的物质力量优越的“国家性情念”的力量，并对此更加看重。特别就第二点来说，可以认为，国家性情念的力量来源于通过对“一君万民”性的克理斯玛崇拜而喷发出的民众的激情和愿望。

我在这里把以民众的激情和愿望为动力，试图让民众和“活着的神”（超克理斯玛）直接结合的国家称为宗教化的“情念国家”。³⁵借用鹤见俊辅的说法，在战争时期的日本，通过对天皇的绝对崇拜而形成的国家宗教化，使得构成日本“国体”的显教和密教中的密教因素迅速膨胀。³⁶当然，农民、渔民的“情念”虽然依然带有非政治性，但只要被纳入到“国体”中去，其意识就会逐渐脱离生命循环的时间周期而不可避免地游离于所生活的土地或大海。

在以克理斯玛为顶点的专制国家，民众和克理斯玛之间通常存在着金字塔型的国家官僚机构。希特勒也好，斯大林也好，古今东西的所有专制体制几乎都存在着强大的官僚机构。³⁷与此相较，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的中国，神灵一般的克理斯玛毛泽东将他自己也参加创建的党和行政体系中的金字塔型官僚机构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官僚阶级”组织而彻底打破，缔造了一个

将自己和崇拜自己的民众直接结合的情念国家。但正如1980年王小强当作“农业社会主义”而加以批判³⁸的那样，从追求以民众的情念为动力来推进社会变革这一点来看，毛泽东所向往的“情念国家”带有浓厚的农本主义特征。

与之相同，在日本，自吉田松阴提倡建立“一君万民”³⁹的集权体制，到农本法西斯主义，其间发生了从昭和初期的血盟团事件、神兵队事件、五·一五事件到二·二六事件等一系列少数“志士”发动的恐怖事件，存在着促进情念国家形成的社会土壤。但日本与中国的区别在于，情念国家在中国是由克理斯玛毛泽东主动与民众直接结合而缔造的，在日本则是由具有农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所谓“皇道派”青年将校推动的，并不是克理斯玛天皇自身所希望的。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生活在等身大的非政治世界的农民被纳入国家政治的过程，大多与上述“一君万民”的农本主义情念国家中的“密教”性装置有关。但是在情念国家形成的时候，往往可以看到，介于民众和克理斯玛之间的国家官僚机构在吸取了民众对克理斯玛的激情信仰之后，也将自身变成了克理斯玛，形成党派集权专制。日本法西斯主义以所谓“统制派”为中心的部分军部官僚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吉本隆明称之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以示与农本法西斯主义的区别。他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就是在两者的“对立和勾结”过程中产生的。⁴⁰

与日本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统制派”类似的国家官僚机构专制，在革命过程中的以及60年代前期的中国，也以共产党组织专制的形式出现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力图打破这种官僚机构的统治。

但无论哪种形式，情念国家的基础都是民众在面临战乱和自然灾害带来的贫困、破产和对日常生活的破坏时寻求救助和加以抵抗的强烈愿望。当然，这种愿望并不能直接联系到“一君万民”性的或毛泽东崇拜之类的克理斯玛崇拜。例如，石牟礼道子在《苦海净土》和《椿海记》⁴¹等作品中所描绘的